

乡土与创作

吉林人民出版社

乡土与创作

乡土与创作

刘绍棠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8\frac{1}{2}$ 印张 5插页 198,000字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210册

书号：10091·874 定价：0.76元

目 录

让我从二十一岁开始.....	(1)
开始了第二个青年时代.....	(4)
看《撩开你的面纱》随想.....	(26)
何期泪洒江南雨.....	(28)
忆华年.....	(32)
希望八十年代出现成千上万的青年作家.....	(45)
又为斯民哭健儿.....	(50)
转业到文艺界以后.....	(55)
惜别与前行.....	(61)
重印《运河的桨声》和《夏天》后记.....	(64)
我认为当前文艺创作中值得注意的几点.....	(72)
野人怀土.....	(80)
被放逐到乐园里.....	(84)
也谈创作上的几个问题.....	(121)
痴情.....	(131)
创作要有自己的特色.....	(133)
我是一个土著.....	(138)
跋涉者的足迹.....	(144)
创作漫谈剪辑.....	(147)
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	(153)
乡土风情画.....	(156)
建立乡土电影.....	(160)

爱护与指引	(165)
我与中篇小说	(170)
乡土与创作	(177)
关于《瓜棚柳巷》的通信	(182)
《蒲柳人家》二三事	(187)
外行·热心·直言	(192)
我们是他的儿女	(199)
春来发几枝	(212)
县志与乡土文学	(215)
在党的指引下埋头苦干	(217)
坚持文学创作的党性原则	(221)
乡土文学的一大成果	(223)
为粗手大脚的爹娘画像	(226)
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	(230)
浅谈农村题材作品	(243)
建立冀东的乡土文学	(245)

附录:

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前记	(249)
要忠实于生活	(250)
生命的春天	(254)
暮春夜灯下随笔	(262)
后记	(267)

让我从二十一岁开始……

春节前，团中央彻底改正了我五七年的问题，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名誉，做了很好的历史结论。这些天来，我收到了老前辈、老朋友、老同学、老读者以及年轻的同志们，从山南海北寄来的祝贺信。我深深地感激他们，深深地感激他们！

重新回到党的战斗行列中来，回到社会主义文艺阵地的哨位上，我的心情是百感交集的。兴奋、激动、悲酸、沉重……交织在一起，缠绕我的心。一九五七年的春节，我还不满二十一岁；一九七九年的春节，我已经四十三岁了。多么漫长的岁月，多么漫长的道路呵！

回首往事，环顾今朝，瞻望未来，我该怎样报答亲爱的党，我该怎样报效祖国和人民，我该怎样答复我的老前辈、老朋友、老同学、老读者以及对于我寄予热切希望的同志们呢？我想得很多，很多。

我想，让我从二十一岁开始吧。让我加倍努力为党的事业奋斗，为祖国和人民效力，为社会主义文学劳作，来弥补我二十一年创作生命的空白。

我将如何开始我的第二次青春，迈出第二次青春的第一步呢？

正是立春那一天，一九七九年二月四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周总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

的讲话》。总理的讲话象春雷，象春风，象春雨，象春光，震荡我心灵，启发我心智，指引我方向，教导我行动。

周总理的讲话，从理论、政策和措施上，发展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指导社会主义文艺建设和繁荣的伟大文献。

然而，这一伟大的文献，却被打入冷宫十几年。如果当初能够遵循周总理的指引，发展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园地也许早已百花盛开，万紫千红，四季常青，锦绣芳华。

因此，今天我们重读这一光辉的历史文献，痛定思痛，必须更深广地思考，更长远地联想，更坚决地实践。我们必须以周总理的讲话为准绳，总结过去，检查现在，开拓未来。

林彪、“四人帮”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统治的十年，万众有目共睹，身遭其害，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除了死抱住“凡是”不放的人，谁不深恶痛绝？为了清除他们的流毒和遗臭，两年多来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揭批。但是，为什么流恶不能荡尽，禁区不能冲破，牢笼不能打破？为什么心有余悸，思想裹足，行动观望？这就必须溯本追源，只有溯本追源才能正本清源。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文艺工作，没有黑线，没有黑线专政，却有左倾错误的几度肆虐。林彪、“四人帮”把几乎百分之百的作家都打下去了，而十七年的几度左倾错误的肆虐中，作家艺术家被打下去多少呢？很不少，很不少呵！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五子登科”，发明者不是林彪、“四人帮”，登峰造极，发展者才是林彪、“四人帮”。十七年中被左倾错误打下去的人，有的是功绩卓著的老

革命，有的是取得不小成就的好战士，有的是党的乳汁哺育长大的赤子。他们究竟为什么被打下去呢？或是由于违忤“长官意志”，或是学术观点上意见不合，或是在艺术上进行新的探索；到底有几个是搞了政治阴谋，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做出了公正的评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如果要真正实行民主与法制，开拓四个现代化的未来，就必须回顾前事，总结前事，以为未来的师戒。不能掩盖前事的真相，设前事为禁区；必须计量前事的惨重损失，吸取前事的惨痛教训，才能珍惜和保卫得来不易的今日，有效地防止历史的悲剧在未来重演。

教育、科学、工业、农业各条战线，已经或正在总结过去，检查现在，因而展现了新生面。难道文艺工作偏偏积重难返吗？不！只要我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的文艺工作必能“奋然而前行”。

让我们自一九七九年立春之日始，文艺工作焕然一新，文艺工作者焕然一新！

一九七九年二月

开始了第二个青年时代

——在黑龙江省青年文学 创作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春节前，团中央彻底改正了我五七年的问题，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名誉，做了一个很好的结论。二十七日《中国青年报》登了报，二月四日，新华社又发了消息。我接到了很多老前辈、老师、老同志、老同学、老读者还有年轻同志们给我的信，那是非常热情的，有些信经过很多辗转才到我手里来的。因为谁也不知道我的地址在哪里。二十多年来，北京市文联和我过去的领导单位团中央，都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读者同志们热情给我写信，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所以北京市的好多单位：文联、《北京文艺》、《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都给我转过信。真是来自山南海北。黑龙江的同志、云南的同志、海南岛的同志们都有，我深深地感激这些同志们，深深地感激。感到一个人度过了二十几年的冬天，一下子就到了很温暖的春天了。重新回到党的战斗行列中来，回到社会主义文艺阵地的哨位上来，我的心情是百感交集的。兴奋、激动、悲酸、沉痛交织在一起，缠绕着我的心。我那几天很木呆呆的，别人慰问我，我的笑都是很有点痴笑，有点傻气的那种笑。我想，一九五七年春节的时候，我还不到二十一岁，到一九七九年

春节的时候，我已经四十三岁了，二十二年，这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又是多么漫长的道路呵，而这漫长的岁月和道路是这样的难熬和难走呀！回首往事，环顾今朝，展望未来，我怎样报答亲爱的党，怎样报效祖国和人民，怎样答复我的这些老前辈、老师、老朋友、老读者和年轻朋友们对我的期待和要求呢？我想了很多，想了很多……

我想还是让我从二十一岁开始，从二十一岁开始吧！因为在五七年的时候，正式把我划成右派的时候，我正二十一岁。让我加倍为党的事业奋斗，为祖国为人民效力，为社会主义文学劳作，来弥补我二十一年多的生命的空白！现在，我感到我是开始了第二个青年时代，我正在迈出我第二个青年时代的第一步。我自己完完全全是党和人民培养起来的一个作者。党和人民在我身上花费的心血是很多的，成本是很高的。所以，我对党的感情，无论是在我划为右派以前，或者是划成右派以后，或者是到今天，都是非常深的。因为我是党的乳汁哺育大的，我的血管里流的是党的血液。

一九三六年，我出生在现在的北京通县儒林村。儒林外史的儒林。但是我们那个村子没有一个念大学的，我是史无前例。通县过去叫通州，是属于河北省的，一九五八年才划归北京。我们那个村子靠运河边，是北运河边一个很小很小的村子。树是很多的。绿树浓荫，泥棚茅舍，没有好房子。我出生的时候才几十户人家，现在才百十户人家。我们那村子都是外来户，没有坐根在这里的老户。因为它是河滩地，所以从外乡来的移民，通过圈套圈的关系，亲属的关系来到这里。有的是垦荒，有的是给人家当佃户，所以说我们那个村是很穷很穷的。运河的整个堤防，把我们村打在外边，大水一来，我们村就成了一个岛子。因为当时出不起钱，只能

出劳力，也占不起地。我们邻近有个大村子，一个几百户的大村子。百分之四十都是地主富农。那个村的地主富农比贫下中农多，我们村主要是给他们当佃户和长工，还有给运河上的大船拉纤，当船夫。我们这个村离北京才七十里路，县城离北京四十里路。李自成失败以后，明末清初农民起义的余波，在我的家乡直到康熙年间才平息下来。这个我就不多介绍了，可以看看南开大学教授谢国桢先生写的《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史料》，那里边谈到我们家乡通县、三河县、潞县那一带的农民起义的余波。义和团运动在我们家乡是很厉害的。义和团，其实是由山东起来的，然后沿着运河北上。山东义和团被袁世凯镇压下去以后，沿着运河北上。真正发展起来，还是在天津到通县这一道线上。我们的村庄，在我小时候，义和团的团员还多得很，不少老太太曾经是红灯照。就在我们家乡的附近，跟侵犯北京的八国联军打了三次很大的战役：一次是河西务之战，一次是张家湾之战，一次是八里桥之战。我们村就遭过八国联军的洗劫。我童年时代看到许多断壁残垣。去年有一家盖新房子，把最后一个历史痕迹弄没了。原来是正房五间，被八国联军烧掉了。就一直那么留着，被沙子淹上了，去年才清了沙子。因为孩子要结婚，所以才盖了房子，最后一点痕迹才没有了。

当我出生的时候，我们的家乡已被国民党出卖了。何应钦跟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一个《何梅协定》，把冀东二十二县划了一个非武装中立区，大汉奸殷汝耕在日寇的卵翼下，以我们通县为首府，成立了一个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告脱离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领导和管辖。所以，我们冀中二十二县在东北沦陷之后，又沦为关内的小“满洲国”。直到一九四二年，八路军到了我的家乡，我的家

乡就变成了抗日游击区。我们村因为在河滩上，十分闭塞，十分偏僻，林莽、蓬蒿满地都是。所以当时抗日游击区流动很大的县政府和区政府，都跑到我们村里秘密办公，一有个风吹草动就跑到河滩上，钻进林莽和蓬蒿丛里去了。我们那个村是很奇怪的，也许因为很穷、很小，不引人注目，从一九三三年《塘沽协定》以后，日本就占领了我们冀东二十二县，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的十二年间，日本兵没有进过我们村子。而离我们村还不到一里地的村子，就遭到烧杀。这是一个奇迹般的现象，十二年没有来过日本人。所以，民主政府在我们村里住着，大家说我们村是块福地。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那是很凶的，我们村一点没有损伤，就是一个草垛溜了顶，还是因为它垛得不好。而在我那个公社是七级，死伤不少人，但我们那个村子却安然无恙，不但没死什么人，什么损失都没有。

我从小就很喜欢听自己的母亲、村中的父老、启蒙的老师 and 说书艺人讲故事。他们启发了我的心灵，培育了我的想象力。民间故事都是很优美动人的，所以我也曾在七月初七的夜晚，到葡萄架下，去看牛郎和织女的相会和听他们的啼哭。当然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后来老人们告诉我说，只有不会说话的小孩，才能够听得见和看得见的。虽然是上了当，但也是很有意思的。

农闲时节，说书的艺人背着一个梢马子，满处说书，我老是追着他，向他提出很多问题。还有一个种瓜的老头，是河边的一个种瓜老头，说《杨家将》和《三国演义》，那是我每天都要听的。他每天都给我瓜吃，因为没人听他的。他是个聋子，我天天都跑到他那里去，听他说书，但是他教我习武，我却没学。他还让我学游泳，腰上拴个绳子，运河很深

的，当时我不敢，后来我也学会了一点。我至今怀着敬仰的心情回忆这两位老人。同志们不久就会看到河北《长城》丛刊选载我的长篇《地火》，其中就有一个说书的艺人和一个看瓜的老头，写的就是我所感念的这两位老人。

我六岁上小学，识字很快，七、八岁就看报纸、故事书、唱本。当时报纸有两种，一个是敌伪的叫《小实报》，汉奸管翼贤办的。一种是我们自己办的油印刊物，叫《胜利报》。十岁以前，我没有离开过我们村；直到四六年我十岁的时候，到通州城里去上学。通州是冀东有名的文化古城。清末，美国教会在通州办了一个大学，叫协和书院，是燕京大学的前身之一。四大家族的孔祥熙就是从这里毕业，后来又在美国留学的。这个学校，出了很多的国民党著名官僚、买办，也出过我们很多北方早期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先烈。

我到通县去的时候，通县还有三所高中，一所专科，三所初级中学，这在冀东其他县份是没有的。一直到解放后，到五〇年，我们通县专区，也只有通县有高中，那十三个县都没有。以后才逐渐办起来。通县在文艺、体育、戏剧各方面都出过一些人。我十岁上高小一年级的時候，有个跨学校的读书会，还出了个杂志，是油印的。我十一岁时被他们吸收入会。他们有个图书馆，藏书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这个读书会多少有一点进步色彩，但不是党的外围，只是不满当时国民党学校的死气沉沉，所以自己办这个读书会。我到高小毕业，也就是两年间，读过鲁迅先生的小说，茅盾先生的《子夜》、《追求》、《动摇》、《幻灭》、《腐蚀》；巴金的《家》、《春》、《秋》；老舍的《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月牙儿》；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以及郁达夫、冰心、沙汀、艾芜、肖军、肖红这些人的作品。我还读过象

张恨水一类人物的小说；张恨水的作品，我差不多都读过。华北和东北那种文人的作品我也读过。我甚至读过现在已为人不大记得的黄庐隐女士的作品。我非常感谢这些大同学们给我读书的机会。一个人的成长总得有人引路和帮助，我感到我们中国有个好传统，老大哥带小弟弟。带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几个大同学，虽然他们后来都没有搞文学，但是他们确实是给我领了路，我是很感念他们的。我在我的长篇小说《春草》里，就写了这么个文学社，也写了这么几个人。虽然不完全是他们的影子，但多少也有他们的部分影子。

上高小开始作文，我从一开始就拒绝命题作文，我认为我不想写的你怎么能让我写。我们的老师是打过我几次手板的。但是当时我在全班最小，功课又比较好，老师本来就偏爱，后来就依了我，自己命题，不限时间，享受了这么一个特权。那个读书会办了一个油印的杂志《益智》周刊，后来改成了《乐群》周刊，以后又被国民党勒令停办了。我看报纸有连载小说，就给这个周刊写了一篇小说。我的这个连载小说题目叫《飘零》，写一个小孩，离家到外边念书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碰了多少好人，完全是模仿刘大白先生的《三儿苦学记》。我还写过武侠小说，人物全用我们班上同学的名字，每个人起个绰号，封这个为寨主，封那个为侠客。同学们都争着看；他们放学都不走，等着看写到哪里了，又写到谁了，真是热烈欢迎，争相传阅。后来被老师禁止了，没有写完。

一九四八年我十二岁，高小毕业考上了北京市立二中，我考得比较好，五千多人考了第一名，所以我就得了公费。国民党公费，决不会按时发给你。公费不来没法生活，我就卖报去了。一个同学借给我五元金元券，在报贩子那里交了

押金。每天早晨三点半我就到灯市东口建国东堂门口趸报去，然后跑遍北京的东城和西城，到七点半以前，就回学校上课。我最初只能卖一百二十份报，后来能卖到三百五十份报，还外带两种杂志。那时候的报纸，你八点以前卖不出去的话，白给人家人家也不看了。我是每种报都留一张，带回学校去看。所以我对解放前北平的各家报纸都很熟悉。报童生活我是很熟悉的，一直很想写。

北京和平解放，我们那个学校在军管会接管之前，也没上课，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成立社团，办壁报，办演剧队。我参加了壁报社，也写点东西，主要还是读书。每天我都跑到王府井大街北口路西的三联书店，带着窝头，再买五分钱花生仁，那时是五百元，在那里可以呆一天，晚饭回校去吃。还有南口路东的老新华书店，东安市场的旧书摊，这些地方是我每天必到的课堂。所以几个月光景，我把解放区的作品，象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都读过了。那时书店都是开架的，随便看，我不仅看了小说，还看了不少历史书。

学校恢复上课以后，社团活动就停止了，当时接管的同志们就把我们这些比较爱好写作的，组成一个学生自治会通讯组，开始给报纸写稿子。一九四九年十月，我十三岁时，第一次发表作品，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生活小故事。从此，就开始了我的文学创作生涯。五〇年便在《光明日报》、《新民报》、《河北文艺》这些报刊上发表小说。

刚一建团的时候，我还不够入团的年龄。入团得十四周岁，我十三。我申请入团，批下来是少先队员。直到五〇年四月底才入团。我获得《河北文艺》小说评奖第三名。河北文联的负责人，文化大革命前的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同志，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到北京招考编创人员，录取了

几个大学生。远千里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希望我到河北文联去。当时我已经念初三，十四岁。他以为，我象冀中和冀南解放区的中学生一样年龄挺大，所以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正求之不得，就回信同意了。同意之后，他派人来接我，到保定下车一到文联，他见我是这么一个小孩子就后悔了。他对我说，你要愿意回去，还可以回去；我说，我不回去了。因为我很小，河北省文联的领导同志都很喜欢我。文联图书馆的藏书可比学校丰富多了。我在办公室里坐不住，不是玩，就是到图书馆看书。远千里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很爱护我，让我多看书。我在河北省文联呆了半年多，这半年多实际上是对我进行一次文学基础训练。我读了一些书，古今中外的名著，也得到有创作经验的老同志们的指教。我非常感激远千里同志，他是一位道德很高尚的人。他比我大二十几岁，我们一直是兄弟相称的。他给我写过二十多封信，从来不称同志，叫兄弟。他对我政治上的教育，使我如坐春风，但是原则性很强。远千里同志很正派，不搞什么私人感情。可是他的批评让你感到很慈祥，感到他是在爱护你，在创作上他是跟我促膝谈心的。我们俩后来是倾诉衷肠，毫无讳言的。他的思想感情波动，也对我讲。五七年把我划为右派，开了三次几千人的大会来批判我以后，远千里同志特地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充满了同情和惋惜，寄予希望和期待。远千里同志刚直不阿，所以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含冤而死。他已经平反昭雪。我是很感念他的。我的成长都是跟这些好的领导、好的长者、好的前辈对我的扶植有关系的。

我在河北省文联，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深深地热爱了孙犁同志的作品，并且也受到了孙犁同志作品的熏陶。我在接受孙犁同志作品的影响之前，虽然发表过十几个短篇小说，但

是对于文学创作仍然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生活强烈的美感，打开了我的美学的眼界，提高了我的审美观点，觉得文学里的美很重要。孙犁同志的作品就是美；文字美，人物美，读孙犁同志的作品，给人以高度美的享受。我从孙犁同志的作品中吸取了丰富的文学营养。我和孙犁同志建立了二十八年的师生之谊。到现在也是这样。孙犁同志对于我们这些人是这样的关心。最近因为我有两个长篇要发表，孙犁同志身体不好，但是表示对我的作品要逐句逐段地来读。五七年以后我们虽然不通音信了，但是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七八年十月，孙犁同志又见到我，久别重逢，跟我谈了很多。其中有三点，我认为是我今后作人作文的指南。第一不要再骄傲了。我应该承认，五七年我在政治上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我有骄傲情绪。对我的批判，某种意义上是好的，我要感谢的。孙犁同志说的这句话是对的，所以我不要再骄傲了。第二不要赶浪头。第三要坚持自己的风格。孙犁同志是我敬仰和热爱的老师，我不但要学习他的作品，而且要学习他的为人。

一九五一年八月，我离开河北省文联，被保送到通县上高中，由于我带回的稿费都交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当时生活很困难，我们家人口很多。所以我就没有钱来上学了。我就给孙犁同志写了封信，寄去一篇小说，这是我第一次给他写信，第一次给他寄稿子。他主编《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我在信上说，如能发表，请赶紧给我寄稿费，我好交饭费。我是八月底寄去的，大概是九月十三日发的。我记得，马上就给我寄来了二十六万元，也就是二十六块钱的稿费，我就交上了饭费。十月又发了我的另一篇小说，我整个学期的费用都有了。从五一年九月到五七年春，不到六年，《文艺周